

“井头山诠释中华文明另一面”

12月15日,宁波秋日的阳光里,河姆渡与井头山的土地静展露着千年文明的温度。这一天,来自全球的139位考古学者在第六届“世界考古论坛·上海”期间齐聚宁波,踏上一次关于文明溯源的学术探访。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古典文明研究院院长李新伟看来,他重返井头山,不仅是为了一次新的田野观察,更是为了一种“认知上的唤醒”。“井头山遗址的发现如同打开一扇新的大门,让我们看见的不只是稻作与黄土,还有海洋的蔚蓝与先民的桨声。”他说。

回望2013年,井头山遗址在偶然的机械钻探中被发现,自此成为东南沿海迄今发现年代最早、埋藏最深的贝丘遗址之一。大量海生贝壳、鱼骨、木制船桨等遗存,构成了一幅八千多年前“向海而居”的生活图景。

“井头山遗址考古领队孙国平很早就相信河姆渡附近必定存在更早的遗址,或许就深埋在海平面之下。”李新伟回忆第一次踏上井头山遗址的情景,他表示,正是宁波考古人的执着,最终让一座藏在时间深处的远古聚落重见天日,也重新诠释了中华文明的另一面——不仅扎根于土地,也早已展开对海洋的探索。

“过去我们叙述中华文明,常以黄河与长江的农耕体系为主线,然而井头山遗址的重大发现提醒着我们,早在八千年前,这里的先民已开始适应海洋、利用海洋。这是一次认知的‘破壁’,也是考古学重新理解文明构成的重要契机。”

从井头山起步,文明的线索一路延伸。李新伟认为,河姆渡文化进一步将稻作农业推向了规模化与系统化阶段。河姆渡遗址展现的大规模水稻田、成熟的干栏式建筑以及刻画精美的纹饰,标志着社会组织与生



井头山遗址

产模式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而更引人深思的是,在施岙遗址发现的河姆渡文化时期古稻田,其规模与结构在当时已处于东亚领先水平,展现出这一地区在稻作文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在此基础上兴起的良渚文化,则成为中国史前社会复杂化进程的高峰。“良渚的水利工程、玉礼器体系与社会层级,在世界文明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而这一切离不开稻作农业所奠定的经济基础与社会组织能力。”李新伟说,从井头山到河姆渡,再到良渚,构成了一个连续的文明演进链,展现长江下游地区在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不可替代的作用。

与此同时,井头山遗址的发现也为南岛语族起源这一国际学术课题提供了关键线索。学术界普遍认为,南岛语族的扩散与东南沿海史前人群的海洋迁徙密切

相关。

“如今我们可以将这一脉络从河姆渡文化向前追溯至井头山遗址,这意味着宁波沿海地区不仅是中华文明海洋性的见证,也可能是太平洋文化传播的起点之一。”李新伟说,文明从来不是孤立的,而是在交流与互动中不断延伸与丰富。

眼下,宁波正以井头山、河姆渡、田螺山、施岙等遗址为核心,规划建设河姆渡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对此,李新伟充满期待:“宁波在遗址保护上展现出难得的远见——从发掘前的预先加固,到多遗址的整体规划,都体现了系统性的保护思路。”

他理想中的遗址公园,不只是一处陈列历史的空间,更应成为一个“连接古今”的生命体。“它可以展现环境变迁的沧海桑田,融合稻作农耕的当代传承,呼应‘宁波港通天下’的城市气质。”李新伟建议,在建设中可引入现代科技手段,让历史可触可感,更重要的是,让遗址真正“活”起来,与当地社区、农业传统、节庆活动形成有机互动,成为一个持续生长的文化生态系统。

井头山遗址与河姆渡文化遗址独特的“饱水保存”环境,为考古研究提供了极为珍贵的条件。木材、编织物、植物种子等有机质遗存大量留存,仿佛一座封存数千年的“时间胶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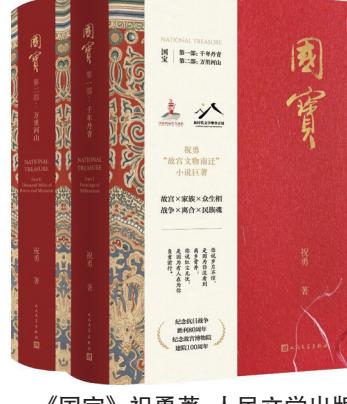
“这次世界考古论坛汇聚了众多国际学者,未来可通过跨学科合作,对木器使用、植物采集、海洋资源开发等具体课题展开更精细的研究。”李新伟认为,正是在这些细微之处,我们或许能更清晰地听见文明生长的声音。

(黄银凤 冯姝涵)

多维解读“国宝”:以文物为叙事媒介



从《故宫文物南迁》到《国宝》——《国宝》对谈活动



《国宝》祝勇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12月11日,由北京市文学艺术联合会主办,北京市文艺研究与网络文艺发展中心、北京作家协会共同承办的“从《故宫文物南迁》到《国宝》——《国宝》对谈活动”,在北京市文联艺术工坊举办。

本期艺苑沙龙活动,邀请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故宫文化传播研究所所长祝勇担任主讲人,中华文学基金会理事长、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施战军担任与谈人,同时邀请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副主任纳杨担任学术主持人,共同探讨国家记忆与文学表达的多重维度。北京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马国颖出席活动。

祝勇首先从文物的本质价值阐述,他指出:“故宫是明清两代的皇宫,但故宫里面的文物却不是,它们是历朝历代的结晶,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财富。”故宫文物南迁这一历史事件,正是在中华文明面临存续危机的关键时刻,先辈们为守护这份物证所进行的壮举。书写文物南迁的故事,本质是书写文明守护的史诗。

施战军则进一步升华了“国宝”二字的含义。他认为:“书名之所以叫《国宝》,不仅仅是指古物,更多的是指中国人、中国的知识分子,以及在抗战背景下中国的

普通民众,他们都是国宝。”这一解读将叙事从“物”延伸至“人”,揭示了《国宝》更深层的创作意图。文物是载体,而守护文物的人所展现的精神、气节与韧性,才是民族真正的无价之宝。

纳杨补充道,文物承载的不仅是个人情感,更是一个国家的文化根基。她以青铜器为例,阐明观赏文物能让人穿越时空,感受古人对天地的认知。这使得《国宝》的叙事超越了单纯的历史事件复述,而成为一场引领读者触碰民族文化根脉的精神旅程。

从非虚构文学作品《故宫文物南迁》到长篇历史小说《国宝》,祝勇创作的转变在于文学性的注入与历史的重构。如何将浩繁的史实转化为打动人心的人物故事,是他面临的挑战。

祝勇坦言创作之初的艰难:“这个题太大,有无从下手的感觉。”他的解决之道,是从宏观史述转向微观命运,将历史洪流中的小人物推至台前。他借鉴了《四世同堂》等经典作品的创作经验,认为成功的艺术品,都是通过小人物、小角度来反映大事件、大时代。为此,他为众多角色精心编制了人物小传,以确保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跨度中,每个人物的画像、成长轨迹

都清晰可见。

施战军高度评价了这一文学化处理,他指出,《故宫文物南迁》中的史实“都活在了长篇小说《国宝》里”。文学化其实就是人生化、命运化、审美化,他生动地描述:“每一个文物和文物连带着的专家、周边的人、家属等,都是带着表情、带着体温、带着血肉的,文物也因此有了自己的血肉。”他认为小说中的人物类型并非符号化、脸谱化的,而是各有“一股劲”的人物群像。

祝勇表示,在那个国势衰微,甚至有人怀疑自身文明的竞争年代,以主角那文松为代表的故宫人,始终相信抗战能够最终取得胜利,而中华文化始终是我们的精神力量和精神后盾。他塑造的石不言,以“你知道李白吗?”反问日本侵略者,继而背诵了一段李白的《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从容就义,表达了对侵略者的文化蔑视。他认为,拥有这种文化力量的民族是不可能被征服的。

施战军认为故事虽然讲的是过去的历史,但其实处处都有当代。他总结了作品的当代意义:其一,珍惜胜利,珍惜和平;其二,守护文化,文化是识别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强大力量的标识。泱泱大国的文化存留,本身就是一种灵魂的歌唱;其三,致力复兴,历经战火与劫难的中华文明,其伟大复兴的核心正在于文化复兴。

纳杨则从文化传承的角度阐释,传统文化早已内化为中国人的情感基因,无论是否饱读诗书,它潜藏在代代相传的家风与日常浸润中,塑造着我们共同的品格与模样,成为血脉深处不可磨灭的文明烙印。

在互动交流环节中,三位学者就读者提出的作品改编、创作方法等问题,做出了真诚而富有深度的解答,使对谈成为一场关于历史、文学与传承的共同探索。

小说《国宝》通过将国家记忆熔铸于一个个具体人物的命运之中,成功地让那段峥嵘岁月穿越时空,在读者心中激荡起关于文化、家园、命运与精神的回响。

(北京市文艺研究与网络文艺发展中心)

科技创新赋能“绿色博物馆”发展

——以上海自然博物馆为例

葛田田 龚成红

2020年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期间,我国宣布“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碳排放目标。在国家战略目标指引下,以科技创新传播绿色发展理念,正在成为博物馆发展新的增长点。

上海自然博物馆(上海科技馆分馆)作为中国颇具影响力的自然博物馆之一,近年来以其前瞻性的生态设计理念与扎实的绿色实践,成为建筑与展陈一体化生态节能的典范。其项目荣获国家“绿色建筑评价标识”三星级、美国LEED金奖等多项权威认证,并将绿色发展的核心理念深度融入建筑设计、运营管理与公共教育中,为博物馆低碳转型提供了鲜活样本。

构筑生态节能体系

被动式设计强调优先利用自然能源与气候条件,通过建筑本身的形态、结构和材料来调控室内环境,最大限度降低对主动式机械设备的依赖。上海自然博物馆系统化应用多项被动式技术,构建了一套高效、低耗的生态体系。

一是形态与布局的生态智慧。博物馆拥有约4000平方米的螺旋上升状绿色种植屋面,不仅形成了独特的城市地标与生态景观,更具备雨水收集与缓排功能,实现了雨水资源化利用。结合馆外人工水体,有效涵养水源、调节微气候。

二是自然采光的艺术与科学。南侧下沉庭院的“细胞墙”——网状玻璃幕墙采光井,将自然光线巧妙引入地下各层,既解决了地下空间的照明挑战,又以生命最小单元的意象强化了自然主题。办公楼屋顶的主动式导光系统,则将阳光高效传输至室内深处,减少日间人工照明能耗。



上海自然博物馆

三是地源热泵稳定环境。通过总计845个地下埋管构成的封闭循环系统,利用土壤恒温特性为建筑提供冬季供暖、夏季供冷的稳定基础负荷,大幅降低传统空调系统能耗,为藏品保存和观众舒适度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温湿度稳定条件。

四是光伏建筑一体化创新。屋顶弧形天窗采用高性能单晶硅光伏玻璃,兼具发电、采光与遮阳调节功能,将可再生能源生产与建筑构件完美融合,直观展示了清洁能源的应用潜力。

此外,空调热回收、高效自然通风等技术的综合应用,共同保障了馆内环境的高舒适性与低能耗运行。

赋能博物馆核心职能

通过测算,综合节水、节能(电力)等措施,博物馆

每年大幅节约运营成本。持续的能耗节约为博物馆的长期运营“减负”,使更多资源能够倾斜于收藏、研究、教育等核心业务,形成了“节能降耗—降低运营成本—提升公共服务质量”的良性循环。

被动式设计不仅服务于节能,更深层次地支撑了博物馆的核心职能:

藏品保护。对温湿度波动极为敏感的动植物、古生物等有机类藏品,得益于地源热泵等被动式与混合式技术提供的稳定、精准的环境控制,得以在更低能耗下实现科学保存,延长文物寿命。

观众体验。从寓意生命生长的绿色屋顶,到模仿地质层理的建筑立面,再到充满光影变化的细胞幕墙,建筑本身成为参观者进入展厅前的“第一序厅”,营造出沉浸式的自然生态环境,无声地传递着尊重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观。

科普教育。博物馆将光伏系统、采光设计、雨水回收等绿色技术可视化、可感知化,使其成为展陈体系的一部分。建筑化身为一座巨大的“生态展品”,也成为面向公众传播“双碳”与绿色发展理念的橱窗,实现了自然历史文化与绿色发展的叠加。

低碳范式引领行业未来

上海自然博物馆的成功实践,为大型公共文化建筑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绿色设计范式。其因地制宜利用自然资源的策略,体现了地域适应性。上海地区随后涌现的多个“绿色博物馆”项目,如上海天文馆、世博零碳馆的探索,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纪念馆在这方面的尝试。这些文博场馆积极探索“零碳展区示范段”建设工作,共同构成了积极的行业演进脉络,以回应“绿色博物馆”倡议。

这些案例表明,博物馆不仅是文化遗产的保存者与阐释者,也可以成为绿色技术创新与传播的先行者。上海自然博物馆的探索,不仅为同类建筑提供了宝贵经验,也间接推动了绿色建筑评价标准的实践与发展,将博物馆绿色发展理念融入规划建设、运营管理、公众服务等各个环节,在更广阔的层面上诠释了博物馆的社会责任与时代价值。

(作者单位:兰州文理学院)

(作者单位:兰州文理学院)



第一套人民币伍圆“帆船”券印钞石版



第一套人民币伍圆券

在中国货币发展史上,第一套人民币的诞生标志着新中国独立自主货币体系的建立。河北博物院举办的“山河永固——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革命文物展”中,一方第一套人民币伍圆“帆船”券印钞石版很是醒目。这块长61厘米、宽45.5厘米、高9.2厘米的石质印版,不仅承载着特殊时期的金融记忆,更凝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经济自主权斗争历程。

沉睡半个世纪的石印版

2001年在河北省邯郸市涉县索堡镇的一次文物调查中,工作人员意外发现了用于印制第一套人民币伍圆“帆船”券的石印版。这块沉睡了半个多世纪的石印版,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成为研究中国近现代金融史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

这块石印版由坚硬的石灰岩精心打磨而成,表面呈现出淡淡的乳黄色,温润光滑,触之可感其历经岁月洗礼的质感。石印版正面残留着均匀的蓝色油墨痕迹,从已经干涸的墨迹可见,其正面以帆船为主要图案,并刻有“中国人民银行”“中华人民民国三十七年”和“伍圆”等字样。选择帆船作为主图案,既象征着中华民族悠久的航海传统,也暗喻着中国经济即将扬帆起航的美好愿景。

经专家考证,这块石印版由中国人民银行第二印制局使用,该印刷局位于河北涉县索堡镇。涉县索堡镇地处太行山深处,地形隐蔽,是华北解放区的重要后方基地,在解放战争时期具有特殊战略地位。选择在此设立印刷局,既考虑了安全因素,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艰苦条件下仍坚持建立独立货币体系的决心。

河北省直文物部门收藏有5块伍圆“帆船”券石印版,这表明第一套人民币印制可能采用了多块印版分工协作的方式。

中国货币史的全新一页

1948年,中国的货币体系正处于一个剧烈变革的历史节点。国民党统治区通货膨胀,物价飞涨令人瞠目。据记载,1948年8月国民党政府发行的金圆券,在短短十个月内就贬值到原值的千万分之一,民众购买日用品需携带成捆钞票,经济秩序几近崩溃。与此同时,各解放区银行发行的货币种类繁多,北海币、边币、抗币等同时流通,币值不一,交易困难。在这种局面下,建立一个统一、独立、稳定的货币体系成为中国共产党经济工作的当务之急。

1948年11月18日,华北人民政府第三次政务会议通过了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决议,将华北银行、北海银行和西北农民银行合并,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并任命南汉宸先生为首任行长。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在石家庄宣告成立,并在同日发行了第一套人民币,其中就包括由涉县索堡镇第二印制局印制的伍圆“帆船”券。

第一套人民币的发行具有多重历史意义:它结束了国民党统治下恶性通货膨胀和外国货币在中国流通的历史;第一套人民币的统一发行改变了各解放区货币林立的局面,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经济重建创造条件;人民币的诞生也象征着中国共产党在经济领域的主权宣示,为新中国成立后的财政金融工作奠定基础。

伍圆“帆船”券石印版的诞生与使用,是中国共产党在军事斗争取得胜利的同时,在经济战线开展的一场无声革命。它标志着中国货币史翻开了全新的一页,结束了近百年来货币混乱、主权丧失的局面,开启了独立自主的金融体系建设之路。

精湛技艺 历史见证

第一套人民币伍圆“帆船”券的印制工艺,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初期货币制造的技术水平和艰苦条件。石印技术作为当时主要的印刷方式,其工艺流程复杂且对工匠技艺要求较高。深入了解这一印制过程,不仅能够领略传统印刷技术的精髓,更能体会到在物资匮乏年代,中国金融工作者克服万难建立独立货币体系的坚定决心。

伍圆“帆船”券石印版的制作流程可分为多个精密环节。首先,需要选取质地均匀、结构致密的石灰岩作为版材,经过打磨使其表面平整光滑。然后,由专业画师用特制的油脂性物质在石板上反绘图案和文字——这是极为关键的一步,因为最终印刷品是正向的,石版上的图文必须是反向的,反绘完成后,工匠会用弱酸溶液腐蚀石板表面,使图文部分略微凸起,增强其亲油性;同时使空白部分更具亲水性。这一步骤需要精确控制时间和酸液浓度,过度腐蚀会损坏图文细节,不足则影响印刷效果。

从现存的伍圆券石印版观察,其表面残留的蓝色油墨均匀细腻,图文线条清晰流畅,可见当时的制版工艺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准。石版上所有文字样工整规范,帆船图案的线条疏密有致、层次分明,展现了设计者和制版工匠的精湛技艺。

在解放战争尚未结束、物资极度匮乏的条件下,工人们常需要自制油墨和改良工具,以解决原材料短缺问题。石版笨重不易搬运,每块重达数十公斤。其耐印力有限,长时间印刷后图文部分会逐渐磨损,需要不断修版或制作新版。此外,石印技术的生产效率较低,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货币需求。

第一套人民币的防伪措施也比较简单,伍圆“帆船”券主要通过精细的图案设计、特殊的纸张和油墨来实现防伪,尚未采用水印、安全线等现代防伪技术。尽管如此,第一套人民币的印制质量仍然达到了相当高的标准。

在数字货币、移动支付日益普及的今天,很难想象货币曾经需要刻在石板上印制。通过伍圆券印钞石印版了解这段历史,能够更全面地认识中国金融的发展历程,理解经济主权的深刻内涵,从而增强历史责任感和金融安全意识。

(作者单位:河北博物院)

投稿邮箱:wenwubao1985@vip.sina.com 采编热线:(010)84078773 发行热线:(010)84079040 广告热线:(010)84079692